



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

上海市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建——

制度型开放：从领会全球规则到制定全球规则

■本报记者 李纯一

浦东开发开放之初，“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”这句话标识度极高，它将浦东的崛起与当代全球化历史进程连接起来。2013年，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在浦东设立。2021年，浦东引领区建设又拉开大幕——引领制度型开放，率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，率先构建高标准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。在释放开放强音的第四届进博会召开之际，本报就何谓制度型开放、为何要推进及如何推进制度型开放等问题，采访了上海市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建。

中国和世界的接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的接轨

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“制度型开放”，此后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，推动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制度型开放。事实上，自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就一直在努力熟悉国际经贸规则。“要素持续进入中国的过程，包括资本、技术，同时也包括知识。中国和世界的接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的接轨。”徐建说，“包括通用的管理知识，现代企业制度，如何签订合同、签订跨国协议等等。华润在改革开放之初给

浦东引领区建设要敢于制定引领国际的新规则

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，以WTO为代表的国际规则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持续发展的经贸格局。2013年，中国开始推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。“我们需要自贸区这样

一个新的载体平台，对接一个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，以适应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度的演进。”徐建介绍。利用政策优惠吸引外资的“政策型开放”已经远远不够，必须推进到更加注重规则的“制度型开放”，以开放倒逼改革，第一站，便选择了浦东。

“负面清单是我们非常重要的，具有‘牛鼻子’效应的制度创新，是对国际通行规则和制度的全面引入。”徐建谈到，“它让我们的制度更加透明、可预期，对政府也是一个很有力的约束。多年来，自贸区在简政放权、政府职能转变、监管方式改进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，这些为我们下一步深入开放，如现在加入CPTPP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”

“我们现在更多强调规则和制度，是因为全球规则在变，我们也相应要变。这是一个适应的过程。”徐建说，“同时，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在国际经贸中的分量逐渐增加，我们也在提出构建自己的一套规则体系。像浦东引领区建设，就是赋予了浦东更重大的使命，不仅要接轨国际规则，融入全球经济运行体系，更要敢于在一些领域制定引领国际的新规则。”

中国开放布局的均衡性是大国优势的体现

“专注出口的未必是强国，但进口做得很厉害，或者进出口很平衡的，一定是一个强国，这意味着你对全球掌控力

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沈玉良——

积极参与数字经济议题谈判，提升中国话语权

对多边领域达成高水平数字经济协定应充满信心

据沈玉良介绍，早在1998年，世贸组织就开始了电子商务方面谈判，成立了电子商务工作组，但当时并无实质性进展。直到2017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世贸组织第11次部长级会议，发布了《电子商务联合声明》倡议。在此倡议之下，陆续有71个世贸组织成员国签署了《电子商务联合声明》，开启了电子商务谈判进程。中国也加入了该谈判，并提出了相关提案。

在该联合声明之下的电子商务谈判已经取得一些早期收获，主要体现在已经达成的两份干净的文本，分别关于电子签名和认证问题、未经请求的商业信息问题。这两份文本最核心的意义在于促进电子商务环境改善。

在此基础上，目前要讨论更深入的问题，诸如隐私保护、数据流动和数据安全等。沈玉良指出，在数字经济时代，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，都离不开网络的全球互联，离不开数据的跨境流动。但数据流动是有条件的，要以数字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为前提，由于主要经济体在上述领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分歧，因而短期内

WTO难以达成高水平数字经济协定。但随着各经济体在数字安全、数据跨境流动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国内规则不断完善，对将来在多边领域达成高水平数字经济协定还是充满信心。

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进博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强调，“中国将以积极开放态度参与数字经济、贸易和环境、产业补贴、国有企业等议题谈判”。沈玉良认为，中国不仅参与了WTO电子商务诸边协定谈判，而且签署了RCEP等高水平自贸区协定，申请加入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(CPTPP)和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(DEPA)，这不仅表明了我国积极推进全球化的决心，而且为数字经济全球化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。

上海新一轮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要注重以数字促进贸易

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年来，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消费市场。进博会是中国在坚持经济全球化、贸易自由化方面的一个重要平台，也是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体现。“我们讲，借助进博会，展品变商品，实际上是强调进

博会对高端商品和服务进口、对消费层级提升的推动作用。上海正在着力做优做强‘五型经济’，大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。在当前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，中国坚持按约举办进博会，践行这种扩大进口的政策，对推进全球贸易增长和加快建设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义。”沈玉良说。

他同时也谈到，上海无论从体量上还是质量上，都已经基本建成了国际贸易中心，进博会这个平台正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是，在新一轮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中，上海也面临新的挑战。“数字化转型是其中至关重要的方面。全球已经处在数字经济条件下，数字化转型是未来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发展中的重要抓手，要注重以数字促进贸易，包括环境的数字化、智慧城市建设、供应链的数字化、从口岸到实体商店的数字化应用等各个方面。”

此外，沈玉良也强调，要把本国或本地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主体，推进高质量发展，注重自主创新，解决一些重点领域“卡脖子”的环节。“上海要把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和科创中心建设紧密结合起来，发挥以企业为中心的网络效应、辐射效应。除了吸引各类外资企业总部，也要吸引国有、民营的中资头部企业，尤其要注重数字贸易市场主体的吸收培育，形成有原创能力的数字服务企业，优化数字营商环境，形成良好的数字贸易生态圈。”

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龚柏华——

为推动世贸组织改革贡献『中国方案』



龚柏华

■本报记者 陈瑜

“20年来，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。”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，习近平主席这样郑重宣告。当前，多边贸易体制面临诸多挑战，WTO规则需要通过改革和现代化与时俱进，已成为国际共识。但改什么、怎么改？各成员各执一词，也使得WTO的未来扑朔迷离。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龚柏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年来获得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机遇，同时也为世界经济贡献了发展动力，形成了中国与世界共赢的局面。当下，中国正在以积极的、建设性的方式参与WTO改革，为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贡献“中国方案”。

WTO改革是回应时代召唤的大势所趋

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。但近年来，由于国际贸易大环境的变化和革新，各方主张改革WTO的呼声与日高涨。2018年，《G20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宣言》明确表示“支持对WTO进行必要改革，以改进其功能”，为WTO改革提供了政治动力，此后WTO相关改革讨论明显加速。

强调WTO需要改革，是不是意味着WTO不行了？在龚柏华看来，这是谈论WTO改革时的常见误读。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为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提供了制度保障，他引用了前WTO上诉机构首席法官詹姆斯·巴克斯的话：“当我想到WTO改革时，我考虑的主要是如何将WTO现代化。”

龚柏华认为，WTO改革是回应时代召唤的大势所趋。“当前，世界经济格局正进行着深刻调整，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抬头，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，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。在此背景下，WTO需要进行必要改革，回应时代发展需要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。另外，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数字经济变革带来的机遇和要求，WTO也应以开放、透明、包容、务实、灵活的方式，建立回应时代发展和业界需求、充分考虑成员发展阶段和能力水平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。”

WTO改革究竟改什么？现在各成员还未达成共识。但龚柏华强调，WTO改革不能与WTO规则现代化相混淆，“在WTO规则形成的时代，气候变化、生物多样性等问题对贸易规则的影响还不明显。现在，WTO规则要针对贸易与气候、环境的关系探索新的规则。目前，WTO正在就渔业补贴、维护粮食安全的公共储备、电子商务及数字贸易、投资便利化、中小微企业议题进行规则谈判。”他还强调，WTO改革应朝着规则化、公平化的方向发展，可针对发展中国家待遇规则和实践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修改和完善。

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

加入世贸组织20年来，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，不断扩大开放，激活了中国发展的澎湃春潮，也激活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。但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，应警惕WTO改革“开倒车”，正如龚柏华强调，“我们要防止WTO改革高度政治化，将WTO改革偷换概念成为专门针对中国的改革。”

作为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，中国始终为WTO改革积极贡献“中国方案”，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沿着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轨道向前行。据龚柏华介绍，中国在2018年11月发布了《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》。2019年5月13日，中国向WTO正式提交了《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》，阐述了WTO改革立场：维护非歧视、开放等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，为国际贸易创造稳定和可预见的竞争环境。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，纠正世贸组织规则中的“发展赤字”，解决发展中成员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方面的困难，帮助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。遵循协商一致决策机制，在相互尊重、平等对话、普遍参与的基础上，共同确定改革的具体议题、工作时间表和最终结果。

“协商一致”是WTO规则谈判的基本原则，在历史上因保障了国际主体平等而具有重要意义。但当前，改革“协商一致”决策机制成为学界的一种呼声，这是为什么？龚柏华解释道，“现阶段的现实问题是，全体成员在贸易谈判场合无法取得广泛共识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WTO协商一致原则制约了效率和多边谈判的进展。因此，在尊重协商一致精神的同时，需要改革协商一致决策模式，推动WTO建立更加合理有效的综合治理模式。探索通过‘联合发起声明’方式，用诸边谈判模式推动WTO体制中一些领域的突破，或许是现实的次优选择。”

WTO改革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艰苦的谈判和多方利益的博弈。在龚柏华看来，目前的WTO改革谈判需要找到共识区，即寻找谈判学中的ZOPA（谈判协议区）。“在谈判的过程中，中国要准备好谈判的筹码和自已可能让步的空间，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和真正底线，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。”他说。



沈玉良

■本报记者 任思蕴

随着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不断发展，全球经济已日益数字化，数字贸易也已成为国际贸易中极具活力的新型贸易形态，成为推动传统贸易转型升级的力量。各国通过数字平台融入全球价值链，享受数字贸易带来的经济全球化的便利与机会。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沈玉良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，入世20年来，中国积极参与WTO电子商务谈判，这对中国未来的数字经济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。



昨天，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周年：互利共赢 共创未来”高层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（上海）召开。

本报记者 陈龙摄